

*Print and Politics: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
Late Qing China.* By Joan Judge.

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. xii+298 pp.

汪榮祖*

這本書研究晚清新興的媒體，以及媒體文字所產生的「威力」(power)。全書分為三部分：首先討論「中間領域」(Middle Realm)的興起，內容包括晚清政論性出版品的出現及其發生的作用，《時報》在「中間領域」之中所扮演的政治與文化角色，以及「中間領域」的理論化。其次，討論政論家與「民眾」，如何提升臣民為國民、如何形成新穎的國民群體、如何為一般民眾的利益呼籲。最後討論到政論家與當權者，新興的「民權」如何與「官權」抗衡，「中間領域」的組織化，以及媒體如何作為文化改革的一個基地，並以「中間領域」在近現代中國的「命運」(fate)作為結論。學者們早已注意到晚清報刊雜誌的興起及其所起的作用，但沒有像這位作者做這樣集中而深入的研究，她對此一議題所作出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。

此書所論「中間領域」主要是研究中國著名報紙《時報》，時間包含清末到民初時代，亦即是從公元 1904 至 1939 年該報發行期間，作者譯述了大量的《時報》言論，使舊報紙裡的死材料又重現人間，並因此建立了清末民初的「中間領域」，頗有助於這一段中國近代史之理解。不過，作者的時限雖然是清末民初，但重點只放在清末，因認為民國以後，《時報》已經式微，

* 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

故覺得無足輕重。但是作者解釋式微的理由（見頁 195-197），似乎並不充分。作者既然認為晚清的《時報》，在新興的「中間領域」裡扮演了政治與文化掮客的角色，並以改進人民生活、提倡公民教育以提升國民政治意識為己任，不知何以辛亥革命之後，報紙為民服務的使命也會隨皇朝消失？事實上，辛亥革命後人民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上的苦難，只有較清末更為加劇，何以一張「提倡改革最具影響力的報刊」（見頁 1-2）卻於此時突然式微？也許《時報》是清末立憲派的喉舌，為當時的社會精英要求清廷給予更多的參政權，得到更多的經濟與財產上的保障。一旦立憲運動隨辛亥革命而告終，提倡君主立憲的《時報》也就由積極而趨消極。

「人民」(people)究竟何指？作者似指窮苦大眾。《時報》固然以大眾之苦來強調立憲的必要，然而真正為大眾說話，又是另一回事。《時報》若真是窮苦大眾的喉舌，應該提倡耕者有其田，或其他平均財富的辦法；蓋非如此，不足以改變窮苦大眾的悲慘命運。從作者所用大量文獻可知，所謂「改革文化」(culture of reform)所代表的利益，社會精英遠遠多於窮苦大眾。《時報》的編者與記者，因無官職，亦自稱為民，但並非一般的老百姓，他們對窮苦大眾的關懷，似乎與舊中國社會父權式的關懷，沒有多大的區別。

作者以很大的篇幅複述《時報》言論，展示這份報紙的用詞遣句，來自多種渠道。不過作者所呈現的《時報》內容，包括源自本土或舶來的政治術語，若熟悉晚清變法思想家的言論，並不十分新鮮。作者英譯中國人名與專有名詞，大都正確，但亦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，如把同盟會的《民報》譯作「人民新聞」(*People's News*)（見頁 49），看過《民報》的人都知道，絕非新聞報紙，而是政論期刊。又如將「宗法」譯作「民法」(*civil law*)（見頁 167），似亦欠妥。作者引用章太炎的意見，認為秀才造反無論在實力、精神、自信上都不如秘密社會（見頁 156），不引章氏原文，卻轉引自並不正確之 Don C. Price 的二手會議論文，不幸被誤導。康有為於甲午戰敗後，主張開國會，但在戊戌變法時，因為希望光緒以乾綱獨斷來推動變法，根本反對開國會，而

作者想當然地認為，康於百日維新期間，將其開議會的論點，「更推進了一步」(a step further) (見頁 163)！恰恰與實情相反。作者提到許多早期報紙期刊，卻完全沒有提到嚴復的《國聞報》。關於《時報》的影響，如果能夠提供行銷的數據，論證就會更加有效。類此未妥之處，作者或可於再版時考慮修訂。